

悟读《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胡汉辉



有幸阅读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的《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翻开巨著，让时光倒流400多年，和黄教授一起走进那个特殊年代的战争……

一位历史学者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将刻板枯燥的信息转化为具有人文深度和哲学高度的生动史实。比如：400多年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萨尔浒战役”（1619年），当时后金以其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搭配雷霆万钧的铁骑，大败过度相信“火器”的明军——故事的精彩程度令人不禁击节赞赏。书中这样描述，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时尚以火器自豪，辽阳总兵刘挺曾派人开谕敌军曰：“我有七种火器，汝不可挡，须速来降！”

而马林在与努尔哈齐遭遇时，亦不畏布阵进行野战。绕营凿壕三道，壕外大炮，炮手皆步立大炮之外。又密布骑兵一层，其余众兵皆下马于三层壕内布阵。马林在阵前庐列两轮战车，每车牌楯上有可发射火器的小孔，期盼能以火力压制敌方。然而战车必须配合准确性和发射率均较高的火器，才能发挥作用。

此外，马林还失策地将大炮均列于壕外。由于各种铳炮的装填缓慢，故两军交战时，满洲骑兵只需不到二十几秒就可以从两百米外突入明军位于壕外的炮阵，而这段时间内，操作各种大小火器的铳炮手只能发射一至二发；快速移动的目标很难被瞄准命中。

这就是黄一农教授笔下“后金铁骑大败守城明军”的详细故事。

读者会在这场“先进与落后的生死鏖战”

思考：热兵器与冷兵器之间的“战场效果”；骑兵骁勇的冲击速度与热兵器发射速度的差异，造成战争的胜与败。那么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人们的意识流里，到底“谁会战胜谁”？

这种先进与落后课题的讨论其实从萨尔浒战役就一直争论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为乾隆皇帝送来象征“盎格鲁-撒克逊工业革命成果和标志军事高科技水平”的“西火大、铜炮、自来大炮、舰船模型……”时，乾隆皇帝不屑一顾。黄一农教授用他对当时史实的调查研究，更深层次地分析当时真实的战争状况：出身晚明福建建阳刻书世家的余应虬，在其《佛古今兵家筹略》一书有云：“夷狄长技莫如马，中国长技莫如车。夷狄长技莫如弓，中国长技莫如火。车静以制贼之火，火远以制贼之近。况马费十倍于车，马施火不若于车。”认为明军凭借火器和战车应足以对付后金的骑兵与强弓。

然而，在关乎明清兴盛的萨尔浒之役中，努尔哈齐凭借着“集中军力，各个击破诸路敌军”的卓越战略，率满兵以冷兵器大败过度迷信火器的明军，证明军事史上由火药所主导的时代尚未能进入中国战场。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拥有快速移动力和万钧冲击力的铁骑，仍是主导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比较当时用火器的战术：如其错误地将火炮置于壕外，且未能做到排枪循环齐放，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或杀伤火网。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一部历史巨著，撇捺飞扬是血脉的史实，不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而是亲临当年的战争场景，深入调查研究，感悟、体验当时战争双方作战的心理状态，然后娓娓描述战争的各种细节。这种精妙语言完全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也是黄教授学问的特质。

再翻著作，故事又跌宕起伏，黄教授又把我们带到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的“吕宋惨案”岁月。这是中国闽南同安人第一次感受“先进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地之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仅用二百炮兵，用先进的“吕宋大炮”，在一个多小时内，残杀了两万多中国闽南人。“吕宋惨案”震惊全世界，也让当时一些在菲律宾的同安人痛定思惊！他们想方设法，得到“西人”信任，学习西班牙人先进的铸炮和“操炮”技术，意在有朝一日，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吕宋惨案”刺激了新式武器的需求。

2014年，福建石狮市博物馆从民间收集到明代兵部尚书黄克缙为其堂兄黄克立撰写的墓志铭。墓志铭上的蝇头小楷言简意赅地说明：在宁远大捷中立下战功的“闽卒”是黄克缙委托侄孙黄调煥从同安招募而来的：“余（指黄克缙）为戎

以继之。谢稚柳观因记。”

当代山水巨匠陆俨少与王献唐也有一段往日翰墨之情。他在亲睹《风荷图》时犹见故人一般，击节称赞之下，兴味盎然地在画幅右下端题道：“丁丑（1937）之变，予避地入蜀，寓居重庆之大江南岸，闲近笔砚，取法汉隶稍近金冬心漆书。不知何以传至胶东王献唐先生，独称誉之，以为近古。实则予与献唐先生初未识面，神交而已。回首往事遂五十年，近因祖识一闻兄话起此神交，承告献唐先生为甚外祖，因予旧有这一段因缘。兹出示风荷一幅，一一翻书，如坐西冷桥下，令人顿忆杭州时也。壬申十月，八四度陆俨少并记。”

始自少年时代的王献唐绘画，从数量上看，或许略少于他的书法之作。然而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看，此道多面作手确为同时代少有。对于王献唐而言，印章一门和书画之道，虽说都是聊以自遣的闲边余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他的完整治学生涯的一个部分，也可看作当时匮乏物质生活的精神犒劳。随着时间推进，所有这一切，皆已汇成了唯王献唐独有的天地人寰的人生大文章。

早在1938年，时为著名教育家和学术领导人的傅斯年，在“致管理中庚夷款董事会”的专函中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著作精富，名闻海内，乃考古及史学之长才也。”1984年，时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的张政烺和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的夏鼐，联名致函文化部：“王献唐先生系山东省近几百年以来罕见的学者，著述遗稿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1994年，孔德成先生在《王献唐先生墓表》中写道：“盖先生一生学术，及目录、版本、校勘、训诂名家于一身，融文字、声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以上所列，已足以让人们通过我国现代时代的各个领域，来充分地认识王献唐其人其事事了。

总之，外祖公王献唐的一生，是为佑护华夏民族文化而不惜奋斗的一生，他历尽劫波洗尽铅华，其坚贞之心从未丝毫改变。历史地看，王献唐是一座取之不尽之不竭的宝藏，他的爱国行为及道德文章，更是后世景仰的丰碑。

面对那厚厚两大册《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犹如面对无际大海一般唯望洋兴叹，一时竟不能尽思其深远广大。我在捧读此书之余，也只能从我的浅薄所知，尝试着对王献唐相关专题做一些唯恐贻笑大方的简单诠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融文字、张书学、李真慧伉俪费心整理的《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何尝不也都是温暖人心的文字呢。作为王献唐的后人，透过这些文篇的字里行间，我分外感受整理者的温馨情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和祖国文化事业的日益昌盛，在当下，人们对于传统历史的认知和渴求，已是势在必行。在此，让我们共同期待本书的二位整理者万般辛苦的广撷博搜，继而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信息，以使王献唐专学尽善尽美。（完）

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努尔哈齐）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指黄克立），孙黄调煥募同安（指泉州府同安县）善铸吕宋炮（红夷大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煥（黄调煥）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内一炮重三千斤，为参将李秉诚取守奉集堡，夷将火狐狸将二万人来攻城，炮发杀死贼八百人，歼其二将，乃火狐狸与哈赤侄也……”这方墓志铭是明清战争非常重要的历史物证。

黄教授得知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因为教务繁忙，让我先行从厦门赶往石狮拓印墓志铭的碑文。第二天晚上，他就风尘仆仆地赶到石狮和我会合。他反复验证碑文的内容之后，便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墓志铭是中国闽南同安人第一次仿造红夷大炮的‘物证’。”不久，他在《明末萨尔浒之役的溃败与西洋大炮的引进》论文中引用史证与物证的关系，从武器和战术的角度探讨红夷大炮的铸造与南洋地方闽南工匠在北京铸造中国第一批红夷大炮并且参加辽东“三大战役”。此一研究匡正了先前学界认为徐光启等天主教徒首先从澳门引进西洋火炮的错误认知。2006年9月，我在《厦门晚报》发表《同安大炮的辉煌》一文，意在把厦门地方史与中国历史之关节相联结，进一步阐述闽南同安人早在明末就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行为和能力的，并活跃在中国的军事舞台上。

文章刊出不久，有厦门年轻学者提出异议。黄教授闻知后告诉我：“史学上有不同争论是很正常现象。而问题的关键，则是必须善于运用史证和物证来验证自己的论点。然而除了史证（黄克缙给万历皇帝的奏折）、物证（墓志铭）之外，还有其它证据吗？”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如果没有考古发现的支撑，就会失之空；但考古学如果没有历史学的指引、支撑，就会失之碎，甚至迷失方向。”（高翔《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 阐扬中华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2版）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是近年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虽然学科属性不同但还是存在不少交接点。文献史学要得到考古学的

印证与检验，文献记载又是考古学家解读考古发现的重要模式。古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内无论是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文献史学的话语背景，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的、融合研究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两周封国的研究面貌即由于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研究而日新月异，例如40余年曾国考古写就的一部“曾世系”；又如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观察。

袁俊杰、贾一凡二先生的专著《小邾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小邾国墓地、青铜器和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文献与地方志史，正是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研究的角度对两周封国之一的小邾国，开展系统研讨的又一范例。这部著作对小邾国墓地及其他相关遗存的考古新发现进行全面梳理，通过考古、铜器铭文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对小邾国墓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礼仪制度研究，分别从墓地着手探讨墓葬制度，由铭文称谓系联媵嫁和册命礼仪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小邾国墓葬制度与姬周、东夷、荆楚墓葬存在差异且具有明显的兼容并蓄特征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媵嫁礼仪由媵婚相随的异辈婚制度向二媵相随的同辈婚制的演变，以及小邾君“名”与“字”真正含义等相关问题。

其次，诸侯国族研究，由考古发掘及追讨的铜器，讨论小邾国墓地铜器铭文所见十余个先秦时期的诸侯国族及其来龙去脉，并考证了这些国族与小邾国之间的联姻、结盟等复杂关系。

再次，墓地铜器研究，是对徐楼盗国墓地、横岭埠遗址、大韩墓地出土和山西省公安厅“603专案组”追缴的小邾国铜器等新出土资料的深入分析。在分析徐楼墓地、横岭埠遗址和大韩墓地性质的基础上，讨论小邾国铜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的原因、小邾国墓地与新发现的韩国墓地之关系等相关延伸性问题。

最后，历史文化研究，是对小邾国的族源与迁徙、分封与灭亡、世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细致研究。探讨了小邾国的族源、对外关系、分封建册、册命受爵及小邾国灭亡的时间，厘清了小邾国国君与国民的族源，复原了小邾国春秋时期的国君世系，深刻揭示了春秋时期小邾国依从霸主强国，依附近邻大国，联合齐国、微国的政治婚姻、外交策略与夹缝生存之道。

除上述主要认识以外，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小邾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提出了

黄教授告诉我，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善于思考并勤于寻觅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口”。为了探索这一“细节”与“突破口”，黄教授不惜远行欧洲各国，终于在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找到明末兵部尚书黄克缙主持铸造的“歼虏大将军”红夷大炮。黄教授把“歼虏大将军”的照片寄给我，他在信中说：“389年前中国最早仿制红夷大炮的硕果，仅有一门珍藏在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英国人将这门火炮编号为2/262，炮身铭文为‘歼虏大将军，万历庚申春，总督秦宁侯陈良弼，戎政兵部尚书黄克缙；督造官黄调煥、高基山、郭应星。铸造谨慎等’。”英国人对炮长、重量、炮内径、炮口处的管壁厚度、火门、铤耳、尾珠等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为破解一个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课题，黄教授不辞劳苦，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佩服之至！一场学术“讨论”，终于在新的历史物证和新的史观面前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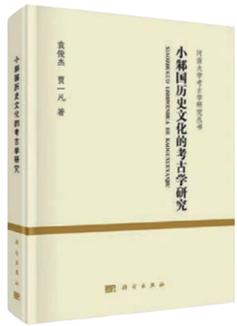
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历史巨著，真的是“关山千万里”啊！然而这千万里关山有多少个“关卡卡”是需要在一个重大的细节去认真、严谨求证的，黄教授不知道走过多少这样的“艰难关卡”，但是他并不畏惧这“万里征途”，锲而不舍地深入调查、研究每一重大历史节点的每一个细节，用史证、物证相互佐证，一直求真相大白，他才会透出欢欣。《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不愧为黄教授用心血铸成的佳作。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作者：黄一农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定价：128元

两周诸侯国族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研究的典范

——读《小邾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杨博



一些新的看法，笔者注意到的有如下几条。

其一，推定小邾国分封的时间当在周宣王后期，受周天子册命为小邾君的时间在鲁庄公十五年至鲁僖公七年，春秋时期小邾国君的世系为邾友父→邾君克→媵雷之夫→邾犁来→邾公克（？）→小邾穆公→小邾恭公→小邾惠公→邾公。战国晚期，小邾国被灭国后，其贵族被迁至楚地江夏县。

其二，小邾国墓葬均无腰坑与殉狗，也无殉葬车马坑，不明显区别于东夷墓葬，而且与中原姬周墓葬礼仪也有明显的差异。随葬礼器为偶数，且为鼎、鬲组合，而不见簋，又有春秋时期楚系墓葬的特点。这种较为特殊的丧葬制度，可能与其地处东夷与华夏交汇、荆楚与中原交接之地，受各处丧葬风俗影响有关。

其三，小邾国君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家臣体系，由铭文可推断小邾国设有大宰、小宰、大司马、左右司马、戎右、司右、齐右、道右、大驭、戎仆、冢仆、道仆等职官。职官设置与其邻近的宋、鲁大体相似，属于周官系统。

其四，横岭埠遗址出土的邾寿父、邾眉父未葬在小邾国墓地，二人应是封邑在横岭埠附近的小邾国宗室贵族，反映了“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的宗法制度。

其五，铸国、滕国青铜器在小邾国墓地出现，证明三国关系密切，可能走上了小国联合互助的发展道路，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政治和外交。铸国为任姓，铸叔为秦妊作器，是“一国嫁女，同姓之国往媵”的体现，从侧面说明小邾国墓地出土的“秦妊”铭文的秦国，并非嬴秦，而是任姓秦国。

其六，除发掘出土的“秦妊”器，追讨者尚有“秦妊”和“华妊”铭器，此三女当来自同一国家，媵嫁礼仪二媵相从，并非一媵一姪，说明当时异辈婚可能逐步消失，同辈婚已成为主流。

综上所述，《小邾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小邾国墓地、铭器新旧材料为基础，综合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聚焦礼仪制度、诸侯国族，对小邾国相关问题全面深入地解读，多有新获，反映了当前两周封国研究的新进展，是两周诸侯国族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研究的典范。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还需请读者诸君留意的是，这部著作是袁俊杰教授、贾一凡博士生合作完成的，属于“河南大学考古学研究所丛书”的第一种。丛书出版的初衷，正如袁俊杰教授所言，是想从某个角度把“我们所推崇与坚持践行的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理念”，如对高校培养科研人才及其学术成绩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这种“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勇于修正错误观点，努力提高科研水平”的治学和育人态度，也是值得提倡并学习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小邾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袁俊杰 贾一凡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168元

■ 连载

集成金玉 熔作文章

——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说起

刘一闻

统观王献唐的印章创作实例，人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脉。这就是以齐鲁地区出土古玺印和西汉魏晋印章为载体的互为借鉴之途。然而，人们同时也看到，王献唐并非泥古不化，在自己各个阶段的篆刻实践中，他不忘请教前贤转益多师，不时明晰并汲取有如海潮许氏、丁氏和潍县陈氏等乡邦先辈的审美法则及雅正理念，自始至终以秦汉风骨为视野标榜，不断拓宽创作路数，进而形成个已篆刻面目。

总的说来，在王献唐的印章作品中，人们既可读到由其自身艺术格调而至的高古意趣，更能见得表现在他刀笔之下的融汇两周金文、齐鲁陶文、秦汉玺印、魏晋印章以及刀布、封泥和砖瓦文字的人印手段。揆其风神为已所用，这也许正是王献唐篆刻由时空而至的与众不同方面罢。

书印同宗和书画同源，这不仅是人们的习惯认识，也是行道中人的共同体验。和传统印章艺术一样，与之相关的王献唐书法创作，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

紫杆颖毫对于王献唐来说，既是须臾不离的书写用具，更是抒发睿思寄托怀抱的亲密伴侣。王献唐能书且久有书名。对于篆法一道，王献唐诸体皆善，举凡甲骨、大小篆及汉隶书和行楷书，可称得心应手。如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他的书法作品，在形式上多数以楹联为主，其次是堂幅，再就是扇面、册页或者题匾、题端一类。视其内容，则大都以古人佳句和自撰诗词为习常。

留存于世的王献唐最多的书法作品是金文大篆一路，这些浇铸在青铜礼器上的各种文字样式字体优美意态丰富，十分接近书写原意。金文书法的兴起，与20世纪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有关，尤其是内中各式古代文字，竟引来书界好古嗜古之风的一时骤起。需要说明的是，与那些不辨时代、不论地区、不分书体的通常写家所不同的是，身具学问家之身的王献唐，恰是由大量深研古器物 and 不断熟识古文字之基而登堂入室的，正因为此，在他的笔下才会重现出三代吉金或峻拔有致或整饬华丽或清迈安雅之无尽风采来。

从广义上说，因为篆籀文字本具一定的视觉之美，故而，王献唐的此类书法之作，时而出现在他所擅长的楹联作品上。譬如《王献唐年谱长编》前页有载的先后作于1933年和1937年，分别为著名剧作家老舍及孔夫子七十六代嫡孙孔德成所书的金文八言，便是他的典型手笔。从中可以看出王献唐于金文之精熟，可说已经到了随手拈来的程度。

相比之下，王献唐可称书法之作的汉隶一体，从总量上讲并不算多，多散见于大字匾额、书名题端以及扇叶小件。

王献唐此路书风的出现时间未必晚于他的篆书书体，这一情形的发生，看来与彼时碑学书法的蓬勃发展态势有直接关联。另者，《年谱》也记录了王献唐青年时代已有临摹多种汉碑的具体信息。记忆中，我曾见他的一件早期小幅绘画上的自题隶书，书风既近古雅秀美的《曹全碑》，亦似委婉浑朴的《华山庙碑》，间而还可循迹《熹平石经》的法则韵味。细察之下，唯见笔性沉稳结体安妥，并能体味到他的由功力积淀而致的笔体特征。

如今，人们在赏读王献唐的隶书作品时，仍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有如翁方纲、桂馥等

清代书家对他的影响。翁、桂两家皆为碑学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们集创作与研究于一身，可谓风格分明著述累累，在碑学一域尤声名显赫。在此，且不论当时是否受到“人人言碑”的习尚影响，然从王献唐的书法一径看，他的始于汉碑文字的研究热情和日后实践之途，大体可称异曲同工。由此看，表现在彼此作品间的理气互衡和体貌相接便也自在想象中。

王献唐的这一类最能全面反映汉碑根底的书法，分别出现在他的各个历史时期。如1932年为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的题扉、1937年为孔莲舫作隶书轴、1939年为朱镜宙绘《维摩室图卷》隶书题诗刻本，以及1954年所题“蒲松龄先生故居”匾额等。

自然是，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中，人们同时还可了解到他在汉碑一域的相辅相成的理论叙述实况。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由于运用广泛，行书一体是人们见到最多的种类，也是最能够体现为书者真实性情的书体。他的这一类早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楷中带行，行里见草的独到笔体意志，人们可以从他的大量题跋文字中进一步读到。

从风格上说，王献唐早期行书在笔体上具有峻峭险绝、锋铍毕现的特性，这一情状的产生，看来与他年少之时对“二欧”父子书法的钟爱有关。在我国历史上，欧阳询书法享有隆誉，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号称“唐初四大家”，所作劲险刻厉、端严自许。其子欧阳通继承家法，兼而有别调。若追索源流，“二欧”之上，便是“二王”楷帖法则，由此可见“二欧”父子的风格接壤。

对于用笔方法的讲究，王献唐在为颜真卿书《东方朔画像赞》的题跋中说“作书用笔，方方圆二种。方出于隶而宜于隶，圆出于篆而宜于篆，皆书体使然。惜抱先生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美，书道亦然。方笔者，阳刚之美也，过刚则失之悍；圆笔者，阴柔之美也，过柔则失之弱。方圆并施，斯为合作，惟楷书能兼之”。从王献唐的这一段表述中，人们自可明晰他对传统用笔特性的一语道破而通衢豁开。结合王献唐的行书作品，人们除了感受他的神接山阴的书写状态外，更能体会作者胎息于“二王”“二欧”的笔体之长。

与书法创作一样，王献唐在绘画上也擅长于各种形式，在题材表现方面，花卉、山水最为常见。此中，花卉一般以写意为主，浅色相衬，逸笔疏疏；山水则以水墨为多，工、放互寓，略施色彩，风格简洁近乎新安画派。很少见到的减笔写意人物，偶尔会出现在作为补景一类的山水画幅之中。

王献唐辛酉年所绘并有隶书题款的家藏《设色木芙蓉图》，为时下所见最早的一件绘画作品。但见图中花蕊双勾填色，花叶没骨挑筋，构图饱满设色雅致，又款识妥帖小中见大，全无稚嫩之态。此后多年，无论是1930年为丁惟汾所作《菊花图》，1938年为屈万里所绘《山居图》，1943年为李炳南所作《雪庐图》，还是1944年身居四川时所作《粟峰读书图》和1948年所作《风荷图》，皆从各个方面映现出王献唐在绘画一域的客观水准。特别是大幅中堂《风荷图》，通篇几乎全以水墨构成，真可谓俯仰向背疏密得宜，枯湿浓淡之下，偶见点染恰到好处。难怪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在观展《风荷图》后，当众兴致勃勃地欣然提笔——“山东高风翰写荷极有妙致，此图足